

对“新文科、大外语”时代外语教育几个重大问题的思考

郭英剑 中国人民大学

摘要: 2019年,是中国外语教育极为重要的一年,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新文科、大外语”的历史发展阶段。本文首先在回顾与评述中国外语教育70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阐释当今外语教育“新时代”的历史渊源与逻辑发展,然后重点论述“新文科”与“大外语”、外语教育与外语专业教育的关系问题。在“新时代”的两大关系中,牵涉了诸多重大问题需要加以认真对待:“新时代”,“新”在哪里?何谓“大外语”?如何建设“大外语”?新时代外语专业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在近年来中国外语界的各种讨论中时常显现,但又常常纠缠在一起,甚至彼此之间的关系被混为一谈。本文试图厘清这些复杂关系,并力图对其中牵涉的重大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思路与发展路径。

关键词: 新时代;新文科;大外语;外语教育;外语专业教育;多语种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82(2020)01-0004-09

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20.01.002

1 引言

2019年,是中国外语教育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是会被载入外语教育史册的一年。

2019年作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2018年9月)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攻坚克难、狠抓落实的第一年。2019年3月22日至24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等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有2 000余位来自全国各类高校、各语种专业的专家、学者、管理者、骨干教师等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这次大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吴岩司长做了题为“新使命、大格局、新文科、大外

语”的主旨报告,围绕新时代高等外语教育的“三变、两新、两大”,即识变、应变、求变、新使命、大格局、新文科、大外语,深入探讨了外语教育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提出了改革与发展的总体要求、总体思路、总体措施和总体目标(吴岩,2019:3)。该报告后来发表在学术期刊上,成为外语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我个人以为,该报告是“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改革的第一声号角,它将中国高等外语教育提高到关系中国同世界各国交流互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设的高度去认识。这一点前所未有的,需要引起外语界的高度重视。

本文将首先简要回顾并评述中国外语教育70年的历程,唯有回望历史才能看清今天外语教育“新时代”的来龙去脉与发展逻辑;然后重点论述“新文科”与“大外语”、外语教育

作者简介:郭英剑,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教育与高等教育。E-mail: yjguo2006@gmail.com; yjguo@ruc.edu.cn。

与外语专业教育的关系问题，而在“新时代”的两大关系中，牵涉了诸多重大问题需要加以认真对待：“新时代”，“新”在哪里？何谓“大外语”？如何建设“大外语”？新时代外语专业教育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在近年来中国外语界的各种讨论中时常显现，但又常常纠缠在一起，甚至彼此之间的关系被混为一谈。本文试图厘清这些复杂的关系问题，并力图对其中牵涉的重大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思路与发展路径。

2 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外语教育70年

要想理解“新时代”，必须了解历史与过往。温故方能知新。以下我将简要回顾并评述我国外语教育70年的发展历程。历史告诉我们，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每一个历史的重要关头，乃至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党和政府都会出台相关的外语教育政策，这些政策对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949年10月，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成立。12月，上海俄文学校成立。1950年，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19所高校相继成立了俄文系、科（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1993：2、5）。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外语院校以及高校中外语院系的诞生，都是伴随着为国家服务、为国家培养所急需的外语人才而兴起并逐步发展起来的。

1951年9月，第一次全国俄文教学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和要求，指出目前大量培养俄文翻译人才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会议结束后，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同志出席总结会并做重要讲话，指出俄文教学在国家建设工作中的重要性。他勉励大家努力完成党和政府所交给的为国家培养俄文干部的艰巨任务。此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外语教育工作会议，也是我国外语教育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会议（同上，1993：6-10）。像这样的会议，此后每隔几年（有时每年）都会召开一次，指导着全国外语教育发展的方向与道路。

1958年，教育部与外交部共同制订了《培养高级翻译十年规划》和《培养初级翻译五年规划》。1959年3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在中

学加强和开设外国语的通知》。这里的外国语主要指的是俄语和英语。同年9月，教育部又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外语课程设置问题的意见》。该意见指出，为提高高等学校学生的外语水平，高等学校本科各专业的学生应在学好第一种外语的基础上，尽可能学习第二种外语；五年制高等学校有条件的专业，应该把第二外语作为必修，目前无条件作为必修的，应尽可能开第二外语加选课；四年制高等学校，不要求必修第二外语，若有条件，也可以开第二外语加选课（同上，1993：60-61）。由此可以看到，在经历了初期阶段，逐步进入正常轨道之后，我国对外语教育就开始做出长远规划。而且，这里所提出的不仅要掌握第一外语，还要尽可能学习第二外语，既代表着国家对外语人才培养的高标准与严要求，也与中国当下“新时代”所提出的多语种人才的培养目标相契合。换句话说，“新时代”我国所提出的“多语种人才”培养的思路与目标，是在半个世纪之前的1958年这里找到历史的源头。而且，这种要求在后来也有延续。1963年4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其中在培养目标中规定：掌握两种外国语（同上，1993：84）。

1964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了教育部等五部门在同年10月制订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其中，第一次将英语确定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纲要》指出，目前高等外语院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不能满足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事工作的需要，整个外语教育的基础同国家需要很不适应，呈现出尖锐的矛盾^①。《纲要》的发布，扭转了当时英语专业停滞不前的状态，也对从1956年以来8年间的外语专业特别是英语（专业）教育的现状提出批评，认为无法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该《纲要》不仅高屋建瓴地提出原则、方针、政策，也提出了具体任务与方方面面的要求。这是我国外语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纲要》也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十年浩劫期间，中国的外语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文革”结束之后两年，1978年8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会议既总结过去，也在研究外语教育如何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做贡献的问题。次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发布了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提出的《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该意

见所提出的指导思想——高水平的外语教育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又红又专的外语人才，对于后来数十年的外语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上，1993：148）。同年4月，教育部发布通知，试行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计划和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实践课教学大纲；10月，教育部转发5月全国高等院校日语专业教材规划会议情况报告，并转发日语专业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供在教学中使用；11月，教育部印发6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德语、法语专业教材规划会议上讨论、制订的高等学校德语、法语专业教学计划，供各高校参照执行（同上，1993：152、164、167）。1980年11月，教育部在青岛召开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大会和第一次会议。会议修订了1980—1985年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选计划，还起草、修订了英、日、德、法、俄等各语种的教学计划草案和部分基础课程的教学大纲草案（同上，1993：185-186）。由此可以看到，我们当今所使用的各个外语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等牵涉具体教学实践环节的所有内容，都是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制订出来并推广至全国高校加以执行的。

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我国首批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及其学科、专业名单，共有博士学位授权单位151个，学科、专业点812个。其中，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专业点有：英语语言文学5个；法语语言文学2个；德语语言文学2个；印度语言文学1个（同上，1993：208-209）。这是我国外语学科发展的新起点，也是外语专业教育上层次上台阶的新起点。从此以后，中国的外语学科发展走上了正轨，并且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1987年12月，国家教委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专业简介》等文件，后者指出：外国语言文学是研究某个国家、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学和文化的一门基础学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是教授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等课程，培养从事翻译、教学、研究、管理工作的外语高级专门人才的一类专业，并明确了培养目标和业务要求的规格，列出了主要专业课程，强调了实践性教学环节（同上，1993：367）。历史地看，这是第一次较为规范地对“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进行定义并阐释其所学内容与培养目标。这样的定义，对于迄今为

止的外语专业教育具有深刻影响。

1998年，教育部以高教司文件的形式颁发了《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该意见认为，21世纪的外语人才应该具有以下五方面的特征，即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好的素质（戴炜栋，2008：66）。该文件的历史意义在于，它首次提出了“宽口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这既标志着国家对于高等教育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新定位，也预示着在新的世纪到来之时，高校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的努力方向（郭英剑，2019a：11）。

通过对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20世纪末这50年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的概要回顾（本世纪以来的20年历史沿革，我将在下一节中加以评述），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外语教育发展具有如下三大特征：第一，它始终与国家乃至民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国家对于外语人才的培养，始终着眼于国家建设与发展之需；外语专业教育的目标始终坚定不移，就是为国家培养专业的外语人才。第二，在这50年间，除了“文革”期间有所停滞之外，国家对外语专业教育的每一步发展都予以指导并逐步规范了各项要求，从培养目标、师资队伍到课程设置、教材规划，再到课堂教学、课外实践，最后到就业出路，事无巨细考虑周全，而且对各个语种（特别是英、俄、德、法等）的教学大纲都做了规范并要求各高校参照执行。第三，国家对于外语专业教育的发展，不是笼而统之，而是分类分层加以指导与管理，因此，外语类院校、综合大学的外语院系、师范类院校的外语院系、理工类大学的外语专业等，全部都考虑到了各自的特点，最终都分门别类地制订了不同的教学计划与不同的教学要求。这50年的发展，为21世纪的中国外语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外语教育的“新时代”，“新”在哪里？

从新世纪开始，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注重内涵式建设，因此，外语教育大踏步走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上。2001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2003年，又下发《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2004年底，教育部推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

的若干意见》。这三个文件为提高教育质量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预示着中国正在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外语（特别是英语）专业教育开始推出“质量工程”建设，以确保本科人才培养质量。这标志着中国的外语专业教育开始走上了有特色的办学之路，共同营造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戴炜栋，2008：22-23）。

然而，恰恰也是在这个时候，英语专业影响力严重下降导致了整个外语专业的影响力在下降，让外语专业在其发展历史上第一次遭遇到了专业危机。这种危机的产生大体上有如下三大原因：第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人才培养提出了更加多元化的需求。无论是国家之需还是社会的需要，只懂外语，特别是只懂一门外语而不懂相关专业，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为此，很多高校开始开展“外语+”的人才培养模式，即除了学习外语，还要学习贸易、金融、政治等相关专业。第二，公共外语教学的大力发展严重冲击着外语专业教育。高校中非外语专业的优秀学生，因为外语好而如虎添翼，他们不仅达到甚至超过了外语专业教育中利用“外语+”模式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水平。第三，海归人士以及懂外语（特别是英语）的人越来越多。从1990年代之后开始的“出国热”，到如今回国创业者逐年递增，加之国内除了高校大批量的外语专业招生外，还有众多的培训机构，使得懂外语的人越来越多，这自然对外语专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郭英剑，2019a：13-14）。

应该说，进入21世纪以来的20年间，中国的外语界一直在不断反思，深入思考外语专业教育所面临的危机以及挑战。这一时期，在英语专业中，大约有两种观点较为盛行，他们针锋相对，各有利弊。一种是要培养复合型人才，一种则是要培养人文学科的通识型人才（郭英剑，2002：7；戴炜栋，2008：70）。应该说，这两种争论深化了新世纪与新时代的英语专业教育改革，对于如何定位外语专业，如何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如何使外语专业适应时代的需要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这样的讨论也对后来的改革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郭英剑，2019a：14）。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讨论对于整个外语专业教育的自我反省与未来发展同样起到了助推作用。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十九大报告提出了

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作为政治术语，“新时代”从此成为一个热词。然而，作为一个带有时间界限的术语，“新时代”又的确可以区分当下与历史。

我个人以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时代”始自2014年，从那时到现在，不过短短5年时间，但教育部从国家层面下达的指令性文件已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②，成为新时代国家注重本科教育、落实课堂改革、加强立德树人的第一声春雷。然而，对于中国外语教育来说，“新时代”到来的前奏是2018年1月《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③的出台。2019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上，教育部高教司吴岩司长做了主旨报告。通过他的报告，我们大体上能够看到新时代之“新”到底在哪里。

首先，站在国家新时代发展的高度，重提外语教育的重要性。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由大到强的发展阶段且注重内涵式建设。但在这20年间，人们几乎很难见到从国家层面专门对外语教育提出具体要求的相关规定与文件。这一次，吴岩司长不但强调高等外语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认为它“覆盖全、规模大、责任重”（吴岩，2019：3）。必须指出的是，这次重提外语教育的重要性，已经远超当年国家急需外语人才时的那种迫切性，是在更高层面上——要求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互鉴、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的高度，去认识当今新时代的外语教育的重要性。站位更高，意味着外语教育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其次，要求充分认识外语教学的危机与挑战，强调必须改变现状。历史地看，这不是国家第一次对外语教学的现状提出批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发表过对外语教育的看法，既提出过批评意见，更给出过改进措施。这次批评的意义在于，如果说过去是外语界同仁内部在讨论外语专业的学科危机与挑战的话，那么，这次则是教育部有关部门领导公开对外语专业教学发表看法。他说，“外语教学不是没有危机，不管是专业外语还是大学外语，都面临着很大的危机”，据此，他不

但提出，“如果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我们就很有可能落在后面”（同上：5），而且还提出，“新形势新挑战迫切需要提高高校外语人才培养能力”（同上：6）。在这里，他既明确指出外语教学（包括专业外语与大学外语）所存在的危机与挑战，也明确表态要求改变这种局面，并提高人才培养的能力。

再次，提出“大外语”的新概念，为未来外语教育指明发展方向。在这里，“大外语”并非严格的学术概念，但相对于过去的外语教育或外语专业来说，它似乎又是一个崭新的观念，描述着未来外语教育的发展道路。在我看来，所谓“大外语”之大，从表面上看至少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外语教育规模巨大，即吴岩所指的，覆盖全、规模大。据他介绍，当下开设外语类本科专业的高校占全国本科高校数量的82.4%；与此同时，目前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下设100个本科专业，占整个本科专业总数的16%，且已经基本覆盖所有建交国家的官方语种（同上：4）。第二，外语教育格局要大，因而承担的责任重大。吴岩（2019：3）说，高等外语教育关系到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质量，因此，“外语教育不是小众的事，甚至不仅仅是大众的事，而是普及化的事”，是国家对外开放的“桥梁”与“纽带”。第三，积极应对技术革命，争取进一步扩大外语教育的影响力。吴岩（2019：6）提出，高等外语教育要积极应对新科技革命，包括翻译软件、机器翻译等所带来的挑战。现在的新技术还较为初级，但假以时日，将会有大发展，这将深刻影响高等外语教育的目标、内容、技术、手段、标准、方法与理念等。

当然，以上我所指出的只是“大外语”之“大”的表面特征。下面，我将深入探讨“大外语”之“大”的内在特质。

4 “大外语”，何以并列“新文科”？

吴岩司长主旨报告的题目是“新使命、大格局、新文科、大外语”。虽然他的这次讲话并不单单在谈外语教育，但他以外语教育为主题并提出了新的观念，因此，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的深入解读，方能理解“大外语”的实质所在。

在此次讲话中，吴岩所提及的“大外语”的内在特质，在我看来，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思想认识站位要高。外语教育不单单是“桥梁”与“纽带”，它还是中国同世界各国交流互鉴的本质所在，也要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之中。这就是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的“新使命”，也是“大格局”。这样的提法，前所未有。

第二，承担文化输出之责。他说，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话语权，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特别是要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外语教育要在这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吴岩，2019：5）。长久以来，外语教育所做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国语言与文化的输入，即将国外的语言与文化引进到中国的语境中；二是在中外文化间担当桥梁，即主要通过翻译或者说是语言服务的方式来达成两者间的沟通与交流。现在，实际上为外语教育提出了“全新”的第三项任务，即要将中国（华）文化输出到国外去。在过去对外语教育的认知中，这一点同样少见。

第三，为国家战略培育英才。吴岩（2019：6）明确指出，“高等外语教育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发展”，即我国要大力培育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练运用外语、精通中外谈判和沟通的国际化人才，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一带一路”等建设急需的懂外语的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等。为此，外语教学，包括外语专业和公共外语教学改革，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用具体举措来推动落实（吴岩，2019：6）。在这里，对于外语人才的规格与目标提得如此之具体，要求如此之高，在此前也较为少见。

由上述“大外语”的表面特征与内在本质，我们已经初步认识到，“大外语”的观念早已脱离了原来我们所理解的、相对狭隘的“外语”教育所能够承担的历史责任，在“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大外语”将承担其新的历史使命与新的职责。

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大外语”，何以并列“新文科”？

一般来说，在中国和中文语境下，“文科”是“人文社会科学”（或称“哲学社会科学”）的简称，也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称。如果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除了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

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基本上都可纳入“文科”范畴。按照一些专家的解释,所谓新文科,是相对于传统文科而言的,是以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王铭玉、张涛,2019)。我们知道,从原则上说,“外语”专业属于“文学”学科门类,属于“文科”的范畴。那么,吴岩报告中之所以将“大外语”与“新文科”并列,我个人以为,原因有三:

首先,两者并列是要强调它们分属各自独立的学科体系。从吴岩(2019:6)的主旨报告中,我们也看到了他对于新文科的建设所给出的发展目标,就是要建设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形成中国学派;同时,他也鲜明地指出了外语教育的新使命与新目标。

其次,我们也可以把两者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是在强调“外语”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意味着在新文科的新时代,外语教育变得更加与众不同,也要承担更加重要的社会责任。从方位上看,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是世界舞台、全球格局、国际坐标,因此要坚持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而在这其中,外语教育要发挥重要作用(吴岩,2019:6)。这就将外语教育在新时代的重要性突出地表现了出来,这一点非同寻常。

再次,我们还可以把它们之间的关系,放在“新使命、大格局”的背景下来理解,“新文科”与“大外语”在各自的前进道路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既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也要相互支撑并肩前行。在跨学科时代,文科各学科之间最容易走向相互跨越与相互协同创新。“对于新的文科专业,将积极支持,加强外语与其他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对于文科的新要求,则需要加强现有的外语专业内涵建设。”(同上)“新文科”的发展,离不开外语学科的帮助,而“大外语”想做大做强,也需要文科各学科的大力支持。“新文科”与“大外语”相辅相成,或许能够走在携手创新的最前列。

5 不能把“外语专业教育”等同于“外语教育”

从新时代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的外语

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分水岭。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在回顾中国外语教育发展史过程中,还是在阅读当下有关新时代外语教育的相关文献中,还有不少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并做出明确的阐释。其中,“外语教育”与“外语专业教育”,就是常常被错误地相互使用、互相叠加乃至混淆不清就加以使用的两个概念。特别是在人们讨论“外语专业教育”时,更是常常与“外语教育”混为一谈。不但社会各界与媒体对此有认识不清的问题,我们在相关报道中也可以看到众多混乱的表述与混用现象,甚至在我们外语界内部,也有一些学者在相关论述中将两者相提并论或者一概而论,误导了大众,也造成人们将“外语专业教育”与“外语教育”等量齐观的错误认识。其实,这两者虽然在教会大家学习外语这一点上目标一致,但在培养对象、使命目标、教学方案与发展路径上则大相径庭,不能混为一谈。

在这里,我觉得十分有必要最先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原其本来面目。

首先,仅从字面上来理解,所谓外语教育,是指所有人接受、参与的与外语学习有关的教育。但外语专业教育,即“外语专业”教育,则是指以获得外语专业学位(degree)为目标或者为目的而接受的专业化教育。前者是统称,后者是特指。前者可以包含后者。需要说明的是,“外语专业教育”有其自身的专业特性,与“外语教育”并不能相互替代,严格地说,也不是互为补充的关系。

其次,如果要从各自的培养目标上来说,我们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外语教育”是要培养会说外语的人,当然,这个会说外语的人,也包括了外语专业的人。但在“外语专业教育”面前,“外语教育”其实主要单指培养会说外语的人,他们可以是高校任何专业的人,也可以是社会上外语学习爱好者,主要以学会外语为目的。简言之,在“外语教育”这里,“外语”是个工具。而“外语专业教育”则专指从外语专业的角度,通过特定的外语专业课程去培养一个外语人。换句话说,“外语专业教育”不是培养只会说外语的人,它要培养的是专业的外语人;“外语专业教育”中,“外语”不单单是工具,它还是专业本身。或者说,“外语教育”所培养的主要是学习公共外语的人;而“外语专业教育”所培养的都是学

习外语专业的人。

再次，从培养方式上看，用“外语教育”的方式来培养需要“外语专业教育”的人，显然会缺乏专业性和针对性。反之，用“外语专业教育”的方式来培养需要接受“外语教育”的人，则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出力不讨好。

我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区分，实在是因为这不仅对“外语教育”很重要，对于“外语专业教育”也同样至关重要。如果按照上述分类，我们再来分析“大外语”，其实不难发现：

第一，所谓“大外语”的观念，首先是指“外语教育”，即主要指通过公共外语学习而成为国家有用之才。“高校要建设新文科，做强外语，要培养‘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吴岩，2019：6）。这里的所谓“‘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其实主要就是那些非外语专业的人才。请看解释：“要培养一流外语人才，确切地说，应该是培养懂外语的一流人才”（同上）。由此可见，站在国家层面上，我们所需要培养的依旧是懂外语的人才。因此，我们要抓紧抓好公共外语教学，把非外语专业的外语教育落到实处，以便培养出更多的懂外语的一流人才。

第二，在“大外语”的时代背景下，“外语专业教育”能培养出时代所要求的“‘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吗？我坚定地认为：同样能！

道理很简单，现在四年制“外语专业”的学生，原本就要求学习二外，只要课程设置合理，要求他们学习并掌握第三外语，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郭英剑，2019b：18）。这种培养方式已经在国内不少高校开展起来。因此，我们要竭力做好外语专业的建设工作，既能培养专业的外语人才，也能培养有才华的外语人进入到其他领域，同样使他们成为懂外语的一流人才。若从历史上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内，我们的外语专业教育所培养出来的绝大多数外语人，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为此，我们的外语专业教育不能妄自菲薄、止步不前。

虽然“外语专业教育”因其自身的专业性而有别于“外语教育”，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壁垒，双方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也可以共同促进、共同提高。

6 外语专业建设在当下面临的最大挑战

就人才培养而言，外语专业教育在当下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我国最高领导人对外语人才提出了直接而明确的要求，也对新时代外语人才的培养发出了号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16年9月27日下午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指出，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中国要想参与全球治理，就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习近平最后强调，要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中国新闻网，2016）

应该说，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成为外语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但令人惋惜的是，讨论仅限于此。对其中所提到的“熟练运用外语”“精通国际谈判”特别是“专业人才”则讨论不多，重视不够。原因大概是“熟练运用外语”对于外语专业来说是默认值，但对于“精通国际谈判”和“专业人才”则又似乎不属于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范畴，这里的“专业人才”至少主要指的不是外语专业人才。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外语界尚未对这一号召做出有力而令人信服回应。这一问题，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与研究。

其次，公共外语教学改革新方案对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构成极大挑战。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2019年4月发布2019年十项工作要点，其中专门列出的一条就是“推进公共外语教学改革”。该项称，为了服务新时代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形成高素质国际化复合型人才、选拔、推送、使用的全链条，要为国家战略培养和储备“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际化人才。为此，高教司在全国22所高校推进试点工作，全面深化公共外语教学改革，在有条件的高水平大学推动开设第二、第三公共外语课程，从而提高公共外语教学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央广网，2019）

对于这项改革要求，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所谓“一精多会”和“一专多能”，是要培养“精通一门外语，会用多门外语沟通交流，掌握一种专业，具有多种外语能

力的复合型人才”（吴岩，2019：6）。第二，这里所说的“推动开设第二、第三公共外语课程”，实际上意味着要在英语之外，开出比如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等的课程来。

我们知道，现在绝大多数高校公共外语教学是以英语为主。如果上述公共外语课程改革实施并取得成功，那么，这不仅对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对于英语专业的教师和英语学科来说都是一枚重磅炸弹！想一想，这就是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未来，一名非英语专业的人不但要掌握英语，还要掌握第二、第三外语，那么，我们的英语专业该如何发展？！这一定是英语专业教育在新时代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为此，英语专业与英语学科的同仁必须要对此做出回答。但遗憾的是，对此，外语界特别是英语界迄今尚未意识到这次公共外语教学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及其可能的后果。

再次，此次公共外语教学改革，无疑是对外语专业特别是人才培养所发出的最重大的挑战，但这更像是一场外语学科内部之战，即：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要与公共外语教学的人才培养展开全面的竞争。然而，与此同时，我同样认为，这次严峻挑战，既是公共外语教学改革与发展的大好时机，也是我们外语（各个）专业全面改革与发展的绝佳时机。我对此的认识是：

第一，公共外语教学改革所提出的“一精多会”“一专多能”，除了主流的英语专业外，对于第二、第三外语的需求，一定能够推动各个外语语种特别是非通用语种的师资队伍建设，并由此带动相关专业的专业发展。换句话说，公共外语教学改革，需要我们各个不同外语专业的大力支持，相关外语专业都有可能成为国家所需要的第二、第三外语。对于外语界来说，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改革的大好时机，既要积极推动公共外语教学改革，也要借机带动外语专业的建设与发展。

第二，坦率地说，我个人认为，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能够更好地完成这次教育部所提出的公共外语教学改革的任务。我提出的改革路径是：以英语专业为例，应加大原有第二外语的课程安排，并提高对第二外语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开设第三外语。我的理论依据是：原本所有外语专业都要学习二外，其实已经是“双语人才”了，不过需要加大对二外的要求，同时增加三外而已。

那么，如何帮助这样的多语种学生成为掌

握其他专业的人才呢？可以利用学校的资源，鼓励学生到其他院系或者不同的专业去辅修、听课等。要知道，其他院系相关专业的课程，既可以用英语或者其他外语讲授的专业课程（这样，还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外语能力），也可以是用母语讲授的专业课（这比学生学第二和第三外语，应该还是轻松一些）（郭英剑，2019b：17-18）。总之，这种用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式培养“一精多会”和“一专多能”的人才，远比非外语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英语外，还要再学习第二和第三种外语要简单得多。

应该说，外语专业教育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更多的是转瞬即逝的发展机遇。唯有迎头赶上，才能不辜负“新时代”所提供的这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7 结论

综上所述，2019年中国外语教育进入了“新时代、新文科、大外语”的历史发展阶段之后，实际上带给外语界一系列的问题、困境与挑战。回顾我国外语教育70年所走过的道路不难看到，我国外语教育与外语专业教育的发展始终与国家建设和发展联结在一起，这一历史传统延续至今。

近年来，中国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外语教育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外语教育也需要再出发。新时代之“新”，就是要站在国家发展的高度认识外语教育的重要性，在充分认识外语教学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的同时，必须审时度势改变现状，而“大外语”概念的提出，为未来外语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大外语”与“新文科”相提并论，充分说明了外语教育在新时代的重要性。在外语教育具体实践中，我们不能把外语专业教育等同于外语教育，两者在教学目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而当下外语教育所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其实是公共外语教学改革所提出的多语种人才的培养方针。虽然这可以视为外语学科的内部问题，但外语专业同样可以为多语种人才培养做出独特的贡献，值得外语界高度重视，并把握住这次外语专业教育发展的大好时机。

在“新时代”，无论外语教育还是外语专业教育，我们的最终目标与使命都是要为国家战略培养和储备“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

国际化人才。□

注释

- ① 该《纲要》详细内容, 请见: 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706/13/t20070613_11731293.shtml。
- ② 具体内容, 参见: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054/201404/167226.html>。
- ③ 具体内容, 参见: <http://pgb.ouc.edu.cn/bkzyjxzljbz/list.htm> (引用时间, 2019-11-22)。

参考文献

- [1] 戴炜栋. 高校外语专业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8)[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 [2] 郭英剑. 从文学理论的缺席谈起——文学教学的目的是什么?[A]. 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2(5): 5-7.
- [3] 郭英剑. 新中国英语专业教育70年——历史考察与反思[J]. 语言教育, 2019a(4): 2-18, 50.
- [4] 郭英剑. 论外语专业的核心素养与未来走向[J]. 中国外语, 2019b(1): 15-19.
- [5] 教育部. 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OL]. https://www.sohu.com/a/227935754_507486, 2018-4-11.
- [6] 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中国外语教育要事录(1949—1989)[Z].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3.
- [7] 王铭玉, 张涛. 高校“新文科”建设: 概念与行动[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3-21.
- [8] 吴岩. 新使命、大格局、新文科、大外语[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原名《中国外语教育》), 2019(2): 3-7.
- [9] 央广网.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布2019年十项工作要点[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2020685226735764&wfr=spider&for=pc>, 2019-4-28.

[10] 中国新闻网. 习近平谈全球治理, 这一类人未来会吃香[OL].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9-29/8019005.shtml>.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oughts and Reflections

Abstract: 2019, a very important year for China'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marks that China has enter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age of "New Era, New Liberal Arts and Significant Foreign Languages".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 and explains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n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Liberal Arts and Significant Foreign Languages,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 Education. In here lie many crucial issues that need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eriously: What is the Newness of the "New Era"? How "Significant" is the "Foreign Language"? How to build up the "Significant Foreign Language"? What are the biggest challenges facing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m? In recent years, these issues often appear in various discussions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but they are often intertwined or even confused with each othe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se complex relationships and try to put forward some solutions to and development paths for the major problems involved.

Keywords: New Era; New Liberal Arts; Significant Foreign Language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 Education; multilingual

(上接扉页)

这样看来,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演变到现在, 已经不是“理论”与“应用”的关系, 而是犹如我们曾经提出的“本体论语言学”和“方法论语言学”那样的区别。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谈对比语言学的应用, 就不是简单的“理论”和“应用”的问题。何况“应用”的说法, 本身恐怕也有问题, 因为这是一种单向的关系: “理论”是现成的, 拿过来可以“应用”; 而“应用”对“理论”却没有反馈。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这是一种双向性的辩证关系: 理论来源于实践, 理论指导实践, 反过来又受实践的检验, 在实践过程中得到修正。